

## 釋憲聲請書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107年 7 月 31 日  
會台字第 12319 號

-2

聲請人 林于如

代理人 李念祖 律師  
李劍非 律師  
林欣萍 律師  
陳思好 律師

目 錄

壹、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	6
貳、疑義之性質與經過暨所涉及之憲法條文 .....	7
一、本件事實經過 .....	7
二、所涉憲法、法律及命令條文 .....	9
參、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 .....	10
一、依據 大院所揭示之重要關聯性理論，刑法第 63 條及刑事訴訟法第 465 條第 1 項規定與本案原判決所適用之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具有重要關聯，且就智能障礙者免受死刑宣判與執行之權利保障至關重要，應為 大院解釋憲法之客體。 .....	10
二、刑法第 63 條僅規定「未滿十八歲與滿八十歲之人」不得處死刑，然「智能障礙者」與未成年人同樣欠缺認知與判斷能力及自我控制能力，刑法第 63 條未將智能障礙者列為不得宣判死刑之對象，顯與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有違，亦與國際共識與各項國際會議決議不符： .....	13
三、刑事訴訟法第 465 條第 1 項之規定，使心智障礙之死刑受刑人死刑是否停止執行，繫於司法行政最高機關之命令，而非當然停止執行，構成殘忍過苛之刑罰，違反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而違憲。 .....	28
四、刑法第 63 條規定及刑事訴訟法第 465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准予對智能障礙者宣判或執行死刑，無法達成現行刑事政策教化、矯治之目的，更過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人格尊嚴與生命權，而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有違。 .....	34
五、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規定之「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	



1	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	
2	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對智能障礙者減輕刑責要件造成	
3	差別待遇，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要求。.....	40
4	六、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之「心智缺陷」與刑事訴訟法第 465 條第	
5	1 項規定之「心神喪失」顯已牴觸法律明確性原則。.....	42
6	七、刑法第 63 條與刑事訴訟法第 465 條第 1 項允許對智能障礙者判處	
7	及執行死刑，顯悖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要求以及憲法第 16 條	
8	對於訴訟權之保障。.....	48
9	肆、確定終局判決案號及所援用之法令.....	50
10		

智能障礙者與心理疾病者於醫學分類上為不同情形，依據學者意見，兩者有以下明顯之差異：

1. 形成原因：智能障礙為智力功能或認知能力之缺陷，可能由生物、遺傳、教育、社會環境等因素導致；心理疾病則偏向個人行為與心理狀態所致。
2. 判斷依據：智能障礙與智力程度有關聯，且通常以智力測驗數值為其中判斷標準；心理疾病則與智力程度無關，智能障礙亦非心理疾病之子類別，甚至患有心理疾病者，同時具備高度智商。
3. 發生時點：智能障礙通常發生於成年前，如出生或幼兒時期；心理疾病則可能於成年後始發生。
4. 治癒可能性：智能障礙為終身性，並無治癒之可能；心理疾病則可透過治療改善或治癒。<sup>1</sup>

本件釋憲主要係針對我國現行法就「智能障礙者」於死刑制度之適用，提出違憲主張，並未涉及心理疾病部份，合先敘明。

<sup>1</sup> 一般認為認定智能障礙 (mental retardation/intellectual disability) 與心理疾病 (mental illness) 屬不同情形，如 Aimee Logan, *Who Says So? Defining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by Science, Sentiment, and Consensus*, 35 HASTINGS CONST. L.Q. 195, 197-8 (2008) ("Mental retardation is a deficit in intellectual or cognitive functioning. Though often confused by lay persons, mental illness and MR are not synonymous. Mental retardation is not a subset or type of mental illness. Instead, "[m]ental illness is caused by bio-psycho-social factors that affect one's behavior and psychological disposition." In contrast, MR is caused by various biological, social, behavioral, medical, educational and hereditary factors. Actual definitions of MR differ widely among professionals and often are "heavily politicized." Definitions do seem to agree on three criteria: an individual's IQ score, their level of impaired adaptive behavior and the age of onset of their symptoms."); Rebecca J. Covarrubias, *Lives in Defense Counsel's Hands: The Problem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Defense Counsel Representing*, 11 SCHOLAR 413, 421-3 (2009) ("Mental retardation is not a form of mental illness but rather a unique developmental condition separate from mental illness. To begin, the first difference is that mental retardation can arise at birth or early childhood and must be present by the time an individual turns eighteen years old. However, mental illness can first be experienced in a person's adulthood. Next, the mo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ental illness and mental retardation is that "mentally ill people encounter disturbances in their thought processes and emotions; mentally retarded people have limited abilities to learn." A mentally retarded person, by definition, must have a low IQ whereas in mental illness, intelligence is not a factor. To illustrate, a mentally ill person suffering from a condition such as schizophrenia can have a very high IQ, while a mentally retarded person always has a low IQ. Another key difference is that a mentally ill person may improve or even be cured with therapy or medication but mental retardation is a life long disability. However, mentally retarded individuals will continually live with diminished intellectual capacity, although they may be able to slowly acquire additional skills and abilities with age.").

憲法第 141 條規定明揭：「中華民國之外交，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則、敦睦邦交、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公民政治與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下稱「兩公約施行法」）第 3 條明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兩公約所保障之人權具有習慣國際法地位，依照「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兩公約已於我國國內施行，可並證明我國對於該等人權公約所承認之人權價值，有明確且直接之肯定，一般認為：「我國雖非前揭世界人權宣言之參與國，故無法直接引用該人權宣言作為憲法解釋之依據，然此並不影響該國際文件所承認之各項人權及價值之普世性質，以及其得以做為解釋我國憲法基本權利內涵之重要考量依據。」<sup>2</sup>我國憲法既已明文規定應尊重聯合國憲章，加上兩公約人權規範於國際間已形成習慣國際法，於我國規範之位階上，兩公約不僅為優先適用之法律，甚至可作為我國憲法人權清單之補充，而具有憲法位階，其所揭櫫基本人權之解釋與規範內涵，更需參照人權事務委員會及經社文委員會解釋，以及與該等基本人權立法意旨緊密連結之聯合國相關決議，加以理解，構成實質憲法之內容。<sup>3</sup>

公政公約第 6 條第 2 項規定：「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死刑非依管轄法院終局判決，不得執行。」1984 年 5 月 25 日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決議批准公布之「Safeguards Guaranteeing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ose Facing the Death Penalty」第 3 條，明確規範對於犯罪時未滿 18 歲者、懷孕者（pregnant women）、甫分

<sup>2</sup> 大院羅昌發大法官於釋字第 696 號及第 694 號解釋之意見書。

<sup>3</sup> 大院歷來參照或引用兩公約之解釋，諸如釋字第 756 號解釋、釋字第 710 號解釋、釋字第 709 號解釋等，均屬適例。

1 婉者、精神狀態失常者 (persons who have been insane) 不得執行死刑<sup>4</sup>。1984  
 2 年時聯合國雖尚未處理到智能障礙者死刑之議題，惟隨即其後於 1989 年 5  
 3 月 24 日更進一步於第 1 條補充，不得對智能障礙者判處或心神能力極度受  
 4 限者執行死刑 (Eliminating the death penalty for persons suffering from mental  
 5 retardation or extremely limited mental competence, whether at the stage of  
 6 sentence or execution) <sup>5</sup>。

7 自此之後，國家不得對「智能障礙者」(mental retardation/intellectual  
 8 disability) 宣判或執行死刑，已成為國際間之共識，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9 2005 年第 2005/59 號決議、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 2010 年作成之 2010/10  
 10 定期報告，以及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落實國際人權公約初次報告之審查  
 11 國際獨立專家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57 點，均多次明文揭禁。

12 1983 年，歐洲理事會各國為推動死刑之廢除，增訂《歐洲人權公約第  
 13 六議定書》(Protocol No. 6 to th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14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concerning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15 Penalty)，要求締約國廢除和平時期的死刑，且經大多數會員國簽署、批  
 16 准<sup>6</sup>，故歐洲可謂已達成全面廢除死刑之狀態。相較之下，現今死刑制度適  
 17 用與限制之討論上，聯合國與美國則具有較豐富之參考案例，美國仍係保  
 18 有死刑之國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更發展一系列判決，處理「不得對智能  
 19 障礙處以死刑」之違憲爭議，並形成判斷「智能障礙」之三個鑑定標準，  
 20 聯合國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智能障礙死刑議題上之相關素材，對於我國  
 21 極富參考價值。

<sup>4</sup> ESC Resolution 1984/50, Safeguards guaranteeing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ose facing the death penalty (附件 1 號)

<sup>5</sup> ESC Resolution 1989/64, Implementation of the safeguards guaranteeing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ose facing the death penalty (附件 2 號)

<sup>6</sup> 目前 47 個會員國中，已有 46 國批准，僅俄國已簽署而未批准，有關《歐洲人權公約第六議定書》的批准或簽署情形，參歐洲理事會網站，  
[https://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conventions/treaty/114/signatures?p\\_auth=CF928nW3](https://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conventions/treaty/114/signatures?p_auth=CF928nW3)。

參照美國精神醫學會所制定心理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V），「智能障礙」則需符合：1.「智力功能缺損」、2.「適應功能缺損」及 3.「智力與適應功能缺損在發展期間發生」，此三標準並經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於多案中所採納，而依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智能障礙者因生理上缺陷而不能完全理解與處理所獲資訊、無法進行有效溝通、無法自錯誤與經驗中學習、無法進行邏輯推理、無法控制衝動、無法理解他人反應等不足，故對智能障礙者科以死刑，尚難以達成死刑應報與預防之目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中之法理，可資反思、參考並為我國所引用（詳後述聲請書第二點）。

聲請人經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養院鑑定，認定語言智商為 65，非語言智商為 51，總智商僅 57，惟刑法第 63 條漏未規定不得對智能障礙者判處死刑，原審法院即於未考量聲請人是否為智能障礙之情形下，逕以最高法院以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392 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而使聲請人受死刑宣告確定，顯已抵觸憲法保障人格尊嚴、生命權等基本人權，以及上揭國際人權規範之意旨，爰依法提起本件釋憲聲請如後，以維權益：

#### 壹、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一、聲請人為殺人等案件，認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392 號刑事判決適用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之「心智缺陷」規定未盡明確，違反法律明確原則；及與該條有重要關聯之刑法第 63 條漏未規定不得對智能障礙者判處死刑；刑事訴訟法第 465 條第 1 項漏未規定不得對智能障礙者執行死刑，以及規定由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命令停止執行，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禁止過苛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人性尊嚴、憲法第 15 條保障之生存權、第 16 條保障之訴訟權與第 22 條人格權等基本人權。

二、聲請人懇請 大院諭知立法者應本於大院本解釋之意旨修正上開法規，聲請人並請求 大院諭知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法院不得對智能障礙者判處死刑，執行機關亦不得對智能障礙者執行死刑。

三、聲請人並依 大院釋字第 725 號解釋、釋字第 741 號解釋及釋字第 757 號解釋之意旨，懇請 大院諭知聲請人得依本號解釋作成之意旨，向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提起再審；並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諭知鑑定單位適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三個要件（詳後述），判斷本件聲請人是否為智能障礙者，以資救濟。

## 貳、疑義之性質與經過暨所涉及之憲法條文

### 一、本件事實經過

（一）緣本案聲請人林于如自婚後即遭其配偶劉宇航進禁止外出工作，亦不許與其朋友聯繫，聲請人除偶爾與親人聯繫外，多處於與外界隔離狀態，更長期受劉宇航家庭暴力與精神之虐待。因劉宇航看管賭場及為六合彩組頭之故，欠下近百萬元債務，長期家庭暴力與沉重財務負擔，使聲請人承受巨大壓力<sup>7</sup>。

（二）本案經台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因聲請人因涉犯殺人起訴，經歷審審判，於 102 年 6 月 13 日由最高法院以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392 號刑事判決（下稱「原判決」，聲證 1 號）駁回上訴而受死刑宣告確定。原判決認定聲請人係因簽賭六合彩、背負卡債與信貸致經濟狀況不佳，基於領取保險金之動機，殺害其配偶劉宇航，並審酌聲請人基於同一犯罪動機

<sup>7</sup> 林欣怡、林慈偉主編，2016 台灣死刑判決報告：10 位精障死刑犯之判決分析，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2017 年 3 月，頁 46（附件 3 號）。

曾於 97 年 11 月 10 日、98 年 5 月 28 日分別殺害聲請人母親林侯月雲及聲請人之配偶之母鄭惠升，且均遭判處無期徒刑確定之情事，而科處聲請人死刑。

(三) 聲請人於一審審理過程中，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委託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養院實施精神鑑定，確認聲請人之智能障礙情形：「根據晤談行為觀察及評估結果，在智力功能方面，根據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其語言智商 65，非語言智商 51，總智商 57，……。班達完形測驗結果顯示：……情緒方面，容易以衝動方式來處理情緒；人際關係方面，其維持人際關係可能感到困難，欽慕關係的相處上亦存有困難；自我功能方面，似乎無法有效的善用自身資源。」，顯見聲請人之智能表現數值顯較一般人為低，屬智能障礙者。（聲證 2 號）。然而，原判決未釐清上開事實，竟僅依據鑑定報告記載聲請人其他檢查均無異常，且係為詐領保險金犯案，犯案後態度冷靜等因素，自行認定聲請人並無智能障礙，全然未考量聲請人心理測驗數值確實低於正常數值，亦未就此再為精神鑑定，即於未詳實調查聲請人是否為智能障礙者之事實情形下，科處死刑<sup>8</sup>。

(四) 實則，聲請人部分供述內容有利於其為智能障礙者之判斷，且精神鑑定報告確顯示聲請人有智能障礙情形。依據我國憲法揭示之基本權保障、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決議，以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規範，不得對智能障礙者判處及執行死刑。惟不僅我國刑法第 63 條規定漏未將智能障礙者列為禁止判處死刑，及刑事訴訟法第 465 條第 1 項漏未規定不得對智

<sup>8</sup> 詳見聲證 1 號。



能障礙者執行死刑，以及規定應由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命令停止執行；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更就何謂「心智缺陷」規範不明，均使我國無從依據憲法及上開國際人權規範踐行對於智能障礙者之權利保障。聲請人爰依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向 大院聲請解釋，以維權益。

## 二、所涉憲法、法律及命令條文

### (一) 本件所涉及之憲法條文：

1. 憲法第 7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2. 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3. 憲法第 16 條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
4. 憲法第 23 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 (二) 本件所涉及之法律條文：

1. 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2. 刑法第 63 條規定：「未滿十八歲人或滿八十歲人犯罪者，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本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者，減輕其刑。」
3. 刑事訴訟法第 465 條第 1 項規定：「受死刑之諭知者，

如在心神喪失中，由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命令停止執行。」

4. 公政公約第 6 條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5 項規定：「一、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二、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死刑非依管轄法院終局判決，不得執行。」、「五、未滿十八歲之人犯罪，不得判處死刑；懷胎婦女被判死刑，不得執行其刑。」
5. 公政公約第 7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非經本人自願同意，尤不得對任何人作醫學或科學試驗。」
6. 兩公約施行法第 2 條：「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第 3 條：「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

### 參、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

一、依據 大院所揭示之重要關聯性理論，刑法第 63 條及刑事訴訟法第 465 條第 1 項規定與本案原判決所適用之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具有重要關聯，且就智能障礙者免受死刑宣判與執行之權利保障至關重要，應為 大院解釋憲法之客體。

(一) 人民聲請憲法解釋之制度目的，不僅在於落實人民受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同時也具備闡明憲法真義以維護客觀憲政秩序之意涵，是凡與具體案件相關聯且必要之法律規範，均得作為聲請釋憲客體或成為大法官審理之解釋之客體，而不以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為限，此即為 大院第445

**號、第737號與第747號解釋等多號解釋所揭櫫之重要關聯性**

**理論**。<sup>9</sup>尤有甚者，大院釋字第737號解釋已明揭，重要關聯標準下，：「如非將聲請解釋以外之其他規定納入解釋，無法整體評價聲請意旨者，自應認該其他規定為相關聯且必要，而得將其納為解釋客體。」

(二) 原判決就認定聲請人是否構成智能障礙，以及是否有刑法第19條第1項之適用時，提及對於智能障礙者處以死刑為酷刑，並依據精神鑑定報告及聲請人犯案過程，認定聲請人並非智能障礙者，故不得主張因智能障礙，不應判處死刑（本案聲請人認為法院之法律見解無誤，所爭執者為其正確適用之法律業已違憲）：

1. 「上訴人之選任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上訴人之智能不足，認不應判處死刑云云。然查，智障者因缺少控制衝動之能力，又無法預期自己行為之後果，故有主張對於智能不足者不應科處死刑，否則即屬『殘酷及非

<sup>9</sup> 大院釋字第445號解釋意旨：「大法官依此規定所為解釋，固以該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為標的，就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有無遭受不法侵害為審理對象。惟人民聲請憲法解釋之制度，除為保障當事人之基本權利外，亦有闡明憲法真義以維護憲政秩序之目的，故其解釋範圍自得及於該具體事件相關聯且必要之法條內容有無抵觸憲法情事而為審理。」（附件4號）大院釋字第582號解釋意旨：「本聲請案之確定終局判決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九六號刑事判決，於形式上雖未明載聲請人聲請解釋之前揭該法院五判例之字號，但已於其理由內敘明其所維持之第二審判決（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八年度上更五字第一四五號）認定聲請人之犯罪事實，係依據聲請人之共同被告分別於警檢偵查中之自白及於警訊之自白、於第二審之部分自白，核與據人罪被害人之父母及竊盜罪被害人指證受勒贖及失竊汽車等情節相符，並經其他證人證述聲請人及共同被告共涉本件犯罪經過情形甚明，且有物證及書證扣案及附卷足資佐證，為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該第二審法院，除上開共同被告之自白外，對於其他與聲請人被訴犯罪事實有關而應調查之證據，已盡其調查之能事等語；核與本件聲請書所引系爭五判例要旨之形式及內容，俱相符合，顯見上開判決實質上已經援用系爭判例，以為判決之依據。該等判例既經聲請人認有違憲疑義，自得為解釋之客體。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應予受理（本院釋字第三九九號解釋參照）。」（附件5號）大院釋字第747號解釋意旨：「按人民聲請憲法解釋之制度，除為保障當事人之基本權利外，亦有闡明憲法真義以維護憲政秩序之目的，故其解釋範圍自得及於該具體事件相關聯且必要之法條內容，而不全以聲請意旨所述或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者為限（本院釋字第445號解釋參照）。如非將聲請解釋以外之其他規定納入解釋，無法整體評價聲請意旨者，自應認該其他規定為相關聯且必要，而得將其納為解釋客體（本院釋字第737號解釋參照）。」（附件6號）

尋常之懲罰』者。惟卷附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養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已明確說明上訴人雖有精神官能性憂鬱症及睡眠障礙，而有失眠、情緒低落、易怒之症狀，但上述症狀不會造成個人對外界知覺理會、判斷作用及自由決定意思的障礙，並認定上訴人行為當時之精神狀態，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或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情形。原判決認無從依刑法第十九條第一、二項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已於理由內予以說明，經核並無不合。」

2. 「上訴人是否確有智能障礙之情形，不能單憑上揭心理測驗之數據為判斷。而上訴人為高職畢業，經營臭豆腐製作、批發事業，行為時為滿二十七歲之成年人，係為詐領保險金而犯案，……觀察其先前所犯放火、殺人、詐領保險給付及事後處理過程，以及長期簽賭六合彩等情狀，實無從認定其智能有明顯低於常人之情形，自難認其因身心障礙、智能障礙，而不應判處死刑。」

(三) 按，刑法第63條規定：「未滿十八歲人或滿八十歲人犯罪者，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本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者，減輕其刑。」本條規定涉及對於特定犯罪人不得處死刑，惟本條不得處死刑者，卻不包括智能障礙，於智能障礙得否處死刑之命題上，刑法第19條第1項與第63條之適用存有必然關聯。復按刑事訴訟法第465條第1項規定：「受死刑之諭知者，如在心神喪失中，由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命令停止執行。」其中「心神喪失」是否等同或包含智能障礙者，而不得對其執行死刑，

同屬智能障礙者應免受死刑之相關規範。

(四) 本件聲請目的在於懇請 大院重新檢視我國法制處理智能障礙者死刑制度之相關規範，落實「不得對智能障礙者判處及執行死刑」，以符合我國憲法及國際人權規範之要求。上開刑法第19條第1項、第63條與刑事訴訟法第465條第1項規定，分別處理智能障礙者責任能力、是否得判處死刑與執行死刑之問題，與「不得對智能障礙者判處及執行死刑」之落實，此等條文間具有密切、重要且必要之關聯，缺一則無法整體評價與達成聲請意旨。依據 大院歷來所揭示之重要關聯性理論，刑法第63條及刑事訴訟法第465條第1項規定顯與本案具有重要關聯，且就智能障礙者免受死刑宣判與執行之權利保障至關重要，固得與原判決適用之刑法第19條第1項一同作為大院解釋憲法之客體。

二、刑法第 63 條僅規定「未滿十八歲與滿八十歲之人」不得處死刑，然「智能障礙者」與未成年人同樣欠缺認知與判斷能力及自我控制能力，刑法第 63 條未將智能障礙者列為不得宣判死刑之對象，顯與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有違，亦與國際共識與各項國際會議決議不符：

(一) 大院解釋所揭示之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係指保障法律地位實質平等，而非形式上平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差別待遇時，應視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及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大院釋字第682號、第694號、第701號、第719號、第722號、第727號、第750號解釋參照）。刑法第63條涉及不

得判處死刑之規定，涉及人民受憲法保障之人性尊嚴、憲法第15條保障之生存權與第22條人格權等基本人權，影響權利誠屬重大，應提高審查密度，是該規定之目的與手段間，應具備緊密關聯，始合於平等原則之要求。

(二) 刑法第63條規定：「未滿十八歲人或滿八十歲人犯罪者，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本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者，減輕其刑。」該立法意旨除落實「尊老恤幼」之精神外<sup>10</sup>，更在彰顯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兒童權利公約等國際人權公約長期以來所形成不得對未成年人處死刑之國際共識，立法目的誠屬合憲，其立法理由即指出：「『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五條揭示『未滿十八歲之人犯罪，不得處死刑。』有超過一百四十個國家為其會員國；另『兒童權利公約』第三十七條提到，對未滿十八歲人之犯罪行為，不得判處死刑或無釋放可能之無期徒刑，並已有一百九十個國家成為該公約之會員國，可知對未滿十八歲之人不得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已成為國際間之共識，基於上開公約之精神及國際間之共識，爰刪除現行第二項之規定。」（附件9號）。

(三) 針對智能障礙者不得宣判及執行死刑一事，在眾多國家中均已發展成司法實務上之慣行，國際間亦已形成共識，透過各項決議一再強調此原則：

1. 1984年5月25日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決議批准公布之「保障死刑犯人權保證條款」(Safeguards Guaranteeing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ose Facing the Death Penalty)

<sup>10</sup> 林山田，刑法通論(下)，2008年，第466頁(附件7號)；蔡墩銘，刑法總論，2011年，第320頁(附件8號)。

第 3 條，明確規範對於犯罪時未滿 18 歲者（persons below 18 years of age at the time of the commission of the crime）、懷孕者（pregnant women）、剛分娩者（new mothers）、精神狀態失常者（persons who have been insane）不得執行死刑<sup>11</sup>。其後於 1989 年 5 月 24 日更進一步於第 1 條補充，不得對智能障礙者判處或執行死刑（Eliminating the death penalty for persons suffering from mental retardation or extremely limited mental competence, whether at the stage of sentence or execution）<sup>12</sup>。

2. 2005 年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所作成 2005/59 決議，明確要求所有仍維持死刑之締約國，除不得對未滿 18 歲者處以死刑外，亦不得對精神上或智能上有缺陷之人宣判或執行死刑<sup>13</sup>（Not to impose the death penalty on a person suffering from any mental 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or to execute any such person.）。
3. 2010 年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作成之 2010/10 定期報告中，同樣要求各會員國不應對智能障礙者或心智能力有重大缺陷者宣判或執行死刑，並肯認大多數法律制度之習慣或實務均係以該原則為其根本基礎，縱使在條約中

<sup>11</sup> ESC Resolution 1984/50, Safeguards guaranteeing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ose facing the death penalty（參附件 1 號）

<sup>12</sup> ESC Resolution 1989/64, Implementation of the safeguards guaranteeing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ose facing the death penalty（參附件 2 號）

<sup>13</sup>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2005/59, The ques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附件 10 號）

並未明文規範，仍應將該原則納入生命權之基本保障範圍，以防止生命權被任意剝奪<sup>14</sup>。(Member States eliminate the death penalty "for persons suffering from mental retardation or extremely limited mental competence, whether at the stage of sentence or execution". Although the prohibition of the execution of the insane is firmly rooted in the customs and practices of most legal systems, it is not explicitly set out in applicable treaties. The norm should be subsumed within the general protection against arbitrary deprivation of the right to life.)

4. 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落實國際人權公約初次報告之審查國際獨立專家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57 點指出：「直到完全廢除死刑之前，中華民國（臺灣）政府應確保所有與判處及執行死刑相關的程序與實質保護措施被謹慎的遵守。特別是心理或智能障礙者不得被判處死刑和/或執行死刑。」（In particular, persons with mental 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shall never be sentenced to death and/or executed）<sup>15</sup>。

（四）再查，「智能障礙」一般所指應為「智能障礙/智能不足（Intellectual Disability）/智能發展障礙症（Intellectual Developmental Disorder）」。根據美國智能及發展障礙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n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AAIDD）於2010年出版的「智能障礙：定義、分

<sup>14</sup> 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apital pun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afeguards guaranteeing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ose facing the death penalty: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U.N. Doc. E/2010/10, Dec. 18, 2009. (A corrigendum was issued on Sep. 21, 2011 under U.N. Doc. E/2010/10/Corr.1.) (附件 11 號)

<sup>15</sup> 102 年國際人權公約初次報告審查之結論性意見與建議（附件 12 號）。



類和支持系統－AAIDD定義指南第十一版」，將「智能障礙」定義為「在智力功能和適應行為上具有顯著限制情形，包含社會與應用技能之限制，並發生於18歲之前」（Intellectual disability is a disability characterized by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in both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 and in adaptive behavior, which covers many everyday social and practical skills. This disability originates before the age of 18.）<sup>16</sup>，適應行為包含概念（conceptual）、社會（social）和應用（practical）三方面的技能<sup>17</sup>。參照美國精神醫學會所制定心理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V），「智能障礙」則需符合：1.「智力功能缺損」、2.「適應功能缺損」及3.「智力與適應功能缺損在發展期間發生」<sup>18</sup>之質與量之判斷基準：

1. 智力功能缺損（functioning deficits）：

(1) 由臨床評估以及標準智力測驗中，確認在智力功能上有缺損，例如在推理、問題解決、抽象思考、判斷、學業學習、以及從經驗中學習等。

(2) 智力功能缺損認定通常以智力測驗數值即智力商數（Intelligence Quotient, IQ，下稱智商）為判定依據，智商低於一般水平數值者認定為智力功能缺損，該一般水平數值由法規訂之，並可進一步就不同智商劃分輕重程度之智力功能缺損。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6條授權公告之身心

<sup>16</sup> 美國智能及發展障礙協會（AAIDD）網站，[http://www.aamr.org/content\\_100.cfm?navID=21](http://www.aamr.org/content_100.cfm?navID=21)（最後瀏覽日：7/31/2018）（附件 13 號）。

<sup>17</sup> 鈕文英，美國智能和發展障礙協會 2010 年定義的內容和意涵，國小特殊教育，第 49 期，2010 年 6 月，頁 22（附件 14 號）。

<sup>18</sup>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著/台灣精神醫學會譯，DSM-5 心理疾病診斷準則手冊，合記，初版，2014 年 8 月，頁 17（附件 15 號）。

障礙等級，以智商低於70為智能障礙認定標準之一  
19。

- (3) 美國各州採取的數值不一，美國各州多以智商70以下為認定基準，依據美國死刑資訊中心（DPIC）網站資料，2002年 *Atkins v. Virginia* 案以前，採取智商70以下者，如肯塔基州、馬里蘭州、新墨西哥州、內布拉斯加州、北卡羅來納州、南達科他州及華盛頓州等，阿肯色州則以智商65以下為認定基準；因2002年 *Atkins v. Virginia* 案修法，採取智商70以下者，如特拉華州（Delaware）與愛達荷州等，伊利諾州則以智商75以下為認定基準<sup>20</sup>。

2. 適應功能障礙（adaptive deficits）：適應功能缺損，造成在個人獨立以及社會責任上，達不到發展以及社會文化的標準；如果沒有持續的支持，其適應功能缺損將導致在家庭、學校、職場、以及社區等環境中，日常生活活動，例如溝通、社會參與、以及獨立生活的受限。

3. 智力及適應功能的缺損發生在發展階段中（the onset of deficits while still minor）。美國智能及發展障礙協會定義為18歲以前<sup>21</sup>；而依據死刑資訊中心（DPIC）網站資料，美國各州亦多以18歲以前為標準，印地安那州、馬里蘭州與猶他州則採取22歲以前之標準<sup>22</sup>。

(五)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透過 *Atkins v. Virginia*、*Hall v. Florida* 與

<sup>19</sup> 行政院衛生署民國97年7月1日衛署照字第0972800153號函（附件16號）。

<sup>20</sup> 死刑資訊中心（DPIC）網站，<https://deathpenaltyinfo.org/intellectual-disability-and-death-penalty>（最後瀏覽日：7/31/2018）（附件17號）。

<sup>21</sup> 美國智能及發展障礙協會（AAIDD）網站，前揭註16（參附件13號）。

<sup>22</sup> 死刑資訊中心（DPIC）網站，前揭註20（參附件17號）。

*Moore v. Texas*三案，明確揭示對於智能障礙者執行死刑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8條禁止酷刑及第14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並依據精神醫學定義與判斷標準認定「智能障礙」，其中法理，可資反思、參考並為我國所引用：

1.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2002年之*Atkins v. Virginia*乙案中，首度宣告對於「智能障礙者」執行死刑構成殘酷且異常刑罰，而與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8條規定有違。在該案中，最高法院強調醫學上之「智能障礙」定義，即需具備低於一般水平之智力功能，於適應行為上（包括溝通、自理及自我導向等）有顯著限制，並於18歲之前展現上開限制或缺陷，但就智能障礙具體要件，則留待各州法律定之<sup>23</sup>，美國數州即因應該案修改有關認定智能障礙之法律規定，如：

(1) 依加州刑法第1376條規定，將「智能障礙」之定義修正為：「於18歲前顯現一般智力功能明顯低於平均水準，且同時存在適應行為上之缺陷<sup>24</sup>」

( Significantly subaverage general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 existing concurrently with deficits in adaptive behavior and manifested before the age of 18) ；

(2) 特拉華州犯罪與刑事訴訟法第4029條則將規定修正

<sup>23</sup> *Atkins v. Virginia*, 536 U. S. 304, 318 (2002). ("Clinical definitions of mental retardation require not only subaverage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 but also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in adaptive skills such as communication, self-care, and self-direction that became manifest before age 18.") (附件 18 號)

<sup>24</sup> California Code, Penal Code - PEN § 1376. 嗣後再將「mental retardation」修正為「intellectual disability」（即現行法）（“ (a) As used in this section,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means the condition of significantly subaverage general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 existing concurrently with deficits in adaptive behavior and manifested before 18 years of age.”）

為：「『嚴重智能不足』或『重大智能障礙』係指於18歲以前即顯現出智力功能顯著低於平均且適應行為受大幅限制者」（“‘Seriously mentally retarded’ or ‘serious mental retardation’ means that an individual has significantly subaverage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 that exists concurrently with substantial deficits in adaptive behavior and both the significantly subaverage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 and the deficits in adaptive behavior were manifested before the individual became 18 years of age”），而「智力功能顯著低於平均」則係指「透過一項以上的標準化個別施測之一般智力測驗，測得智商數值為70分以下者」（“‘Significantly subaverage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 means an intelligent quotient of 70 or below obtained by assessment with 1 or more of the standardized, individually administered general intelligence tests developed for the purpose of assessing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sup>25</sup>）；

- (3) 愛達荷州刑事訴訟法第19-2515A條將智能障礙之定義修正為：「本條所稱『智能障礙』係指至少在以下二個行為層面中存在一般智力功能顯著低於平均、且伴隨適應功能上的嚴重限制：溝通、自理、

<sup>25</sup> Delaware Code Title 11. Crimes and Criminal Procedure § 4209. 嗣後再將「Seriously mentally retarded」及「serious mental retardation」均統一為「Seriou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al disorder」（即現行法）（“‘Seriou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al disorder’ means that an individual has significantly subaverage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 that exists concurrently with substantial deficits in adaptive behavior and both the significantly subaverage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 and the deficits in adaptive behavior were manifested before the individual became 18 years of age”; and “‘Significantly subaverage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 means an intelligent quotient of 70 or below obtained by assessment with 1 or more of the standardized, individually administered general intelligence tests developed for the purpose of assessing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

日常生活、社交或人際交往能力、社區資源運用、自我導向、功能性學業、工作、休閒健康與安全。上開所稱顯著低於平均的一般智力功能與適應功能的嚴重限制須以發生於18歲以前為限。」（“（1）As used in this section: (a) ‘Mentally retarded’ means significantly subaverage general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 that is accompanied by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in adaptive functioning in at least two (2) of the following skill areas: communication, self-care, home living, social or interpersonal skills, use of community resources, self-direction, functional academic skills, work, leisure, health and safety. The onset of significant subaverage general intelligence functioning and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in adaptive functioning must occur before age eighteen (18) years.）；而就「一般智力功能顯著低於平均」之定義，則與特拉華州犯罪與刑事訴訟法第4029條相同，均採取智商數值70作為標準。（（b）‘Significantly subaverage general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 means an intelligence quotient of seventy (70) or below.”<sup>26</sup>）

2. 其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2014年5月 *Hall v. Florida* 案進一步揭櫫，佛羅里達州以智商數值作為認定智能障礙之唯一標準，並據以作為執行死刑之依據，過於僵化，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8條禁止酷刑及第14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最高法院指出，佛羅里達州以智商數

<sup>26</sup> Idaho Statutes, Title 19 Criminal Procedure, Chapter 25 Judgment, Section 19-2515A.

值70之嚴格智商標準認定心智障礙，不僅忽略其他醫學上如適應行為之智能障礙判斷標準，更已忽略智商判斷之誤差現象，以及智商在醫學領域上不應理解為固定數字，而是範圍之概念<sup>27</sup>。此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亦於2017年之*Moore v. Texas*乙案宣告德克薩斯州刑事上訴法院適用之Briseno standard<sup>28</sup>包含非臨床醫學專業判斷因素，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8條之規定<sup>29</sup>。據上可知，美國實務就「智能障礙」之認定，係採取：1.「智力功能缺損」、

<sup>27</sup> Hall v. Florida, 134 S. Ct. 1986, 1994 (2014). ("And nothing in the statute precludes Florida from considering an IQ test's standard error of measurement (SEM), a statistical fact reflecting the test's inherent imprecision and acknowledging that an individual score is best understood as a range, ..... Clinical definitions f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which, by their express terms, rejected a strict IQ test score cutoff at 70, and which have long included the SEM, were a fundamental premise of Atkins.") (附件 19 號)

<sup>28</sup> 2004 年 Briseno (Ex parte Briseno, 135 S.W.3d 1, 5 (Tex. Crim. App. 2004)) 一案中，德州刑事上訴法院 (The Texas Court of Criminal Appeals, 以下簡稱 CCA) 因智能障礙需符合之「適應功能障礙」要件「過於主觀」(exceedingly subjective)，自行創設七個要素以評斷被告是否有智能障礙，並將此一判斷權責交由個案中的事實發現者 (原文：factfinders in the criminal trial context might also focus upon in weighing evidence as indicative of mental retardation or of a personality disorder)。以下為 CCA 於該案所提出之七要素 (下稱「Briseno 標準」(Briseno Factors/Standard))：

1. 最熟知個案中被告於發展階段情形者 (例如：家人、朋友、老師、僱用人、有關當局等)，是否認為被告於該階段即有智能障礙之情形？如是，被告當時的實際行為是否符合「智能障礙者」之表現？(Did those who knew the person best during the developmental stage - his family, friends, teachers, employers, authorities - think he was mentally retarded at that time, and, if s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at determination?)
2. 個案中被告是制定計畫後加以執行，或是基於衝動行事？(Has the person formulated plans and carried them through or is his conduct impulsive?)
3. 個案中被告的行為是否展現其具有領導能力，或者是被他人所引導？(Does his conduct show leadership or does it show that he is led around by others?)
4. 姑不論社會觀感是否可接受個案中被告的行為，其行為是否屬於對外界刺激的合理且適當的回應？(Is his conduct in response to external stimuli rational and appropriate, regardless of whether it is socially acceptable?)
5. 個案中被告對於口頭與書面問題是連貫、理性、確實地作答，或跳題回應？(Does he respond coherently, rationally and on point to oral and written questions or do his responses wander from subject to subject?)
6. 個案中被告是否為自己或他人之利益而隱匿事實或虛偽陳述？(Can the person hide facts or lie effectively in his own or others' interest?)
7. 姑不論個案中被告的犯罪行為惡性是否重大，其犯行是否是經過預謀、策畫及複雜的目標執行？(Putting aside any heinousness or gruesomeness surrounding the capital offense, did the commission of that offense require forethought, planning, and complex execution of purpose?)

<sup>29</sup> Moore v. Texas, 137 S. Ct. 1039, 1053 (2017). ("By rejecting the habeas court's application of medical guidance and by following the Briseno standard, including the nonclinical Briseno factors, the CCA's decision does not comport with the Eighth Amendment and this Court's precedents.") (附件 20 號)

2.「適應功能缺損」及3.「智力與適應功能缺損在發展期間發生」之三個精神醫學定義與判斷標準，更強調不可以非臨床醫學專業判斷因素加以認定。而美國各州規範智商數值者介於65至75間，透過科學、客觀方式建構之心智障礙認定標準。

(六) 根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智能障礙者」係指「成長過程中，心智的發展停滯或不完全發展，導致認知、能力和社會適應有關之智能技巧的障礙」之人<sup>30</sup>，是智能障礙者其在理性、判斷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上均有不足之處，而其本質於可責性上實與未成年人無異。換言之，智能障礙者與未成年人同樣係因本身心智上之限制，而難以理解刑事政策、刑罰與罪責之意義<sup>31</sup>。就此，最高法院曾於102年度台上字第4289號刑事判決肯認：「人之生存權，應受法律保障，死刑之剝奪生命，具有不可回復性。且現階段刑事政策，尤以心理或智能障礙者對於刑罰之理解不足，實際上與未成年人無異」（附件22號）。此參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所定之身心障礙者鑑定表<sup>32</sup>（參附件16號），將心智商數與心智年齡相互對應，亦足明之<sup>33</sup>。亦即，心智商數與年齡均係用以判斷心智狀態或智能障礙之

<sup>30</sup>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民國97年7月1日衛署照字第0972800153號函，同前註19（參附件16號）。

<sup>31</sup> 劉靜怡，智能障礙者與死刑爭議，月旦法學教室第156期，2015年10月，第9-10頁（附件21號）。

<sup>32</sup> 根據身心障礙鑑定表，心智商數介於69至55間，即相當於心智年齡介於九歲至未滿十二歲之間；心智商數介於54至40，即相當於心智年齡介於六歲至未滿九歲之間；心智商數介於39至25，即相當於成年後心智年齡介於三歲至未滿六歲之間；心智商數小於或等於24，即相當於心智年齡未滿三歲。由此更可證明，智能障礙者與未成年人具備相同之特性，即其智能均與一般成年人有落差；甚且，心智障礙者之心理年齡，自障礙發生之日起至死亡為止，永遠處在介於三歲至十二歲之間。

<sup>33</sup> 司法院民國91年6月6日（91）院台廳家三字第14712號函：「由於現行法律對身心障礙者缺乏系統化的保護措施，致使他們常不知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也常得不到應有之尊重與保護，尤其是心智障礙者。依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之身心障礙等級顯示，心智障礙者的心智狀態有其特殊性，他們的心理年齡，自障礙發生之日起至死亡為止，永遠處在介於三歲至十二歲之間。他們的心智狀態，不像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者，可以依慣有發作或不發作的情形來判斷，而會隨著生理變化與社會發展能力間的交互影響，游走於完全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與無行為能力之間，所以他們真實的心智狀況，常是模稜兩可，難以辨認。」（附件23號）

客觀依據，並得相互對照，兩者都可作為反映受鑑定者或受試者之智能是否不達一般成年人智能之標準，具有相同之意義，而在法律上應受相同之評價。

(七) 而查，我國多數學者與法律實務工作者亦一再呼籲參照國際共識，我國不應對智能障礙者宣判或執行死刑：

1. 王正嘉指出：「從公政公約來看，其要求的死刑審查基準，必須考量幾個因素，最基本的出發點是，第6條第2項『情節最重大之罪』，是死刑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並不是准許判處死刑之條款，而是一個例外的限制條款，就此來說，僅限於『蓄意』且『造成致命或極嚴重之後果』的犯罪，且應該按照HRC的一般性的一般性意見與各項解釋，排除上述歷史犯罪，並且禁止唯一死刑。其次，就刑事程序上，所憑藉判決與實踐的程序法律，不能抵觸公約，包括公約第14條的各項規定，最後還需考量處以死刑對象的限制，禁止對『未滿18歲人』、『精神障礙者』與懷孕婦女執行死刑等公約規定。……

本文認為最切要的是要釐清公政公約的例外條款範圍，除了公約條文明示的18歲之人和孕婦外，事實上國際獨立專家通過的國家人權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57條也表示『應確保所有判處及執行死刑相關的程序與實質保護措施被謹慎的遵守，特別是心理或智能障礙者不得被判處死刑和/或執行死刑』而此建議，相當於人權事務委員會的解釋，原本可為法院所引據才是，而且就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289號判決所建立的刑罰受容性標準，也可進一步發展，至少須按照被告在審判時的實



質精神狀況進行審查，並非按照行為時，而應考量對於此類對象裁處或執行死刑適當與否，而融入整體死刑裁量基準內。……據此而言，前述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3062號判決，將精神障礙從例外條款排除，認為精神障礙並不在兩公約規範範圍內，但卻忽略了其他國際人權法對於兩公約立法意旨的影響。連同更早的其他判決，將公政公約的死刑除外條款，錯誤地解讀為行為時的精神狀態，而非審判時的行為人特質，進而認為不符合刑法第19條規定即可宣告死刑，此見解不僅違誤，也混淆了責任認定與刑罰裁量的位階<sup>34</sup>。」。

2. 劉靜怡教授亦明揭：「智能障礙者不應被科處死刑，已經逐漸成為國際共識，然而，反觀我國法院，對於智能障礙者是否適合科處死刑的辯論，仍然採取相當保守的態度<sup>35</sup>。」
3. 學者林慈偉亦指出：「於*William v. Jamaica*（609/1995）案和*R.S. v. Trinidad and Tobago*（684/1996）案中，HRC亦認為，判處心智障礙人士係違反公約第6條第1項規定。另外，在對Japan的結論性意見中，HRC表示關注Japan對未成年人及心智障礙之人處以死刑之情形，此意味著對心智障礙之人處以死刑是違反公約第6條第1項規定的。……按公約第6條第5項：『未滿十八歲之人犯罪，不得判處死刑；懷胎婦女被判死刑，不得執行其刑。』及HRC之相關解釋，即死刑之適用對象，不及於18歲以

<sup>34</sup> 王正嘉，論死刑之裁量與界限：以兩公約與比較法為出發，臺大法學論叢，第45卷第2期，2016年6月，頁711-712、720、739（附件24號）。

<sup>35</sup> 劉靜怡，前揭註31，頁11。（參附件21號）

下之人及精神障礙者。……死刑判決對象限制上，我國刑法第63條已明文規定未成年人不得判處或執行死刑，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欠缺之人，對於刑罰之理解不足，實際上與未成年人無異，自應本於相同意旨及相關人權基準明文禁止對於精神或心智障礙者判處死刑<sup>36</sup>。」

4. 陳怡凱亦認為：「公政公約第6條第5項與人權事務委員會所發表之關於第6條之『一般性意見』均沒有對此一禁令之明文規定。但人權事務委員會在1995年之美國國家報告與2008年日本之國家報告之結論建議書中均有表示對於精障者不得科處或執行死刑，在R.S.控訴千里達與托巴哥（R.S. v. Trinidad and Tobago）之個人申訴一案中，人權事務委員會也暗示此種見解。國際人權法之學者也對於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採取相同之解讀：禁止對精障者科處或執行死刑。此外我國自辦之國家報告程序中，國際人權專家在2013年3月所作出之結論建議意見第58點，也同樣明白表示『具有心理或智能障礙的犯人不應該被判和/或執行死刑』。因此本人認為，根據國際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公政公約第6條第5項不得科處死刑之範圍，已經從未滿18歲者與孕婦之外，擴張及於精障者<sup>37</sup>。」
5. 廖福特教授亦提出：「本文認為，在實質內容部分，102年度台上字第2392號判決認為應該審視智能不足者是否

<sup>36</sup> 林慈偉，從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論死刑裁判之人權基準，軍法專刊，第61卷第4期，2015年8月，頁145-146、167-168。（附件25號）

<sup>37</sup> 陳怡凱，國際人權法在我國法院之適用，憲政時代季刊，第40卷第3期，2015年1月，頁354（附件26號）。

得科處死刑，但是卻未直接面對議題之方式，並沒有解決實質問題。102年度台上字第4289判決內容是符合人權事務委員會之意見，其內涵符合『公政公約』之實質內涵，應予贊同，亦有論者認為此判決備受讚許。而最根本的議題是不應該對於精神或智能障礙者判處死刑或執行死刑，法官及法務部在判決及審核執行死刑之前均應審慎為之<sup>38</sup>。」

6. 錢建榮法官亦曾批評：「……因為公開的量刑辯論，外界始得以知悉林于如的智商竟然只有不如小學生的『57』！這個智商已比財經法院判決因為智能障礙，自白殺人不足採信而判決無罪的『空總女童姦殺案』的許榮洲的『69』更低。最高法院放著專業的鑑定報告不論，反其道而行，沉溺於檢警主要依據被告林于如自白所架構的『縝密犯罪計畫』（有無共犯？），以『無從認定其智能有明顯低於常人之情形』就不採信。如果這樣的邏輯可行，自白殺人棄屍，還懂得清洗犯罪現場的許榮洲也不該是智能障礙之人？！更別說最高法院堅拒被告出庭，連被告『最後一面』都不願見（不敢見？），如何判斷被告智能正常，又如何決定被告生死？本案辯護人一再引用早已成為我內國法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及人權事務委員會一般性意見，強調對於智障或精障者一概不能判處死刑，否則就違反兩公約禁止『恣意』判處死刑的人權保障規定。最高法院卻只會

<sup>38</sup> 廖福特，「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內國法化之影響：最高法院死刑相關判決之檢視，臺大法學論叢第43卷特刊，2014年11月，頁938-939（附件27號）。

在被告行為當時不符欠缺或辨識力減弱的刑法第十九條減刑事由上打轉。這種『雞同鴨講』的理由，突顯最高法院對於兩公約人權保障的認知嚴重不足外，心中只有『形式法律』全然不尊重包括生命權在內的憲法基本權利<sup>39</sup>。」

(八) 綜上以述，刑法第63條「未滿十八歲之人不得處以死刑」之規定，其背後之立法精神及規範意旨應係在彰顯「因心智上缺陷無法完全理解刑罰意義，而不具備可責性之人」不應宣判或執行死刑此一意旨，而年齡、心智商數等均係用於推斷心智狀態之判斷標準；從而，既然「未達一定年齡之人」不得處以死刑，則與其同樣因智能障礙而乏可責性之「心智商數未達特定數值之人」，即應同樣以「不得處以死刑」規範之。縱使智能障礙者之理性、判斷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狀態無法完全類比未成年人，仍同屬因心智上缺陷無法完全理解刑罰意義，而不具備可責性之人，自應免受死刑之判處。刑法第63條為達成「因心智上缺陷無法完全理解刑罰意義，而不具備可責性之人」立法目地，卻漏未將情形等同未成年人之智能障礙者納入規範，其目的與手段間難謂具備緊密關聯，而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相違。

三、刑事訴訟法第 465 條第 1 項之規定，使心智障礙之死刑受刑人死刑是否停止執行，繫於司法行政最高機關之命令，而非當然停止執行，構成殘忍過苛之刑罰，違反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而違憲。

(一) 按國家刑罰權之發動與實施，侵害人民權利甚鉅，故應審慎檢視是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最低要求（包括獨立、公正之

<sup>39</sup> 錢建榮，最高法院死刑量刑辯論淪為「異鄉人」的審判！全國律師，2013 年 7 月，頁 25（附件 28 號）。

審判機關與程序，並不得違背憲法第 77 條、第 80 條等有關司法權建制之憲政原理），此參 大院第 384 號解釋，即足明之<sup>40</sup>。就此，多數學者亦將正當程序原則作為刑事程序之重要核心，並將正當法律程序與發現真實、保障人權併列為刑事訴訟之目的：

1. 林俊益大法官指出：「刑事訴訟之目的，係建構在人權保障基礎上，刑事訴訟之目的在此基礎上，層次有三：一、實體正確裁判、二、遵守法定程序、三、創設法律和平，……刑事訴訟之目的，並非為求真實，而不計任何代價或使用任何手段，發現真實必須在正當之程序作用下，方為所許<sup>41</sup>。」
2. 陳運財教授亦認為：「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反映於刑事程序中既然是要求無辜不處罰之消極的實體真實

<sup>40</sup> 大院釋字第 384 號解釋明揭：「前述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兼指實體法及程序法規定之內容，就實體法而言，如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就程序法而言，如犯罪嫌疑人除現行犯外，其逮捕應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同一行為不得重覆處罰、當事人有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人之權利、審判與檢察之分離、審判過程以公開為原則及對裁判不服提供審級救濟等為其要者。除依法宣告戒嚴或國家、人民處於緊急危難之狀態，容許其有必要之例外情形外，各種法律之規定，倘與上述各項原則悖離，即應認為有違憲法上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現行檢肅流氓條例之制定，其前身始於戒嚴及動員戡亂時期而延續至今，對於社會秩序之維護，固非全無意義，而該條例（指現行法，下同）第二條所列舉之行為，亦非全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防制，但其內容應符合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乃屬當然。」（附件 29 號）；另參許玉秀大法官釋字第 654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亦係自正當法律程序出發，以建構刑事被告之訴訟權保障之落實：「憲法第 16 條保障的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從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來看，一旦進入程序，就是要保障被告的防禦權。本院大法官自從釋字第 582 號解釋以來，也已將刑事被告防禦權，定位為具有憲法位階的權利。……（三）防禦權的核心：不自證己罪、受辯護人協助、無罪推定刑事被告為了抵禦有罪控訴，不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遭到控訴和審判的資訊，就是第一個最安全的防禦方法，此所以緘默權為防禦權的重要內涵，緘默權所倚賴的基本原則一不自證己罪原則，就是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保證被告防禦權的基本原則。不自證己罪原則及所發展出來的緘默權，經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之後，也已具有憲法位階<sup>4</sup>。被告縱使緘默，國家龐大而無限的資源，也很容易用來羅織入罪，因此防禦權的第二道防線，就是讓與檢察官具有同樣專業知識的人協助被告防禦。被告能選任辯護人，獲得辯護人充分的協助，於是成為刑事被告防禦權的第二個重要內涵有了強有力的辯護協助之後，如果採證不嚴謹，所有的防禦權可能徒勞無功，所以需要無罪推定原則，對防禦權做第三道的保障。無罪推定原則的內涵，包括證據裁判原則也就是要求法定證據方法的嚴格證明法則、罪疑有利被告原則，基本的定義就是：被告經過這兩個下位原則的檢驗，而認為有罪之前，應該被當作無罪之人對待。」（附件 30 號）

<sup>41</sup> 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上），2016 年 9 月，十六版，頁 22 頁（附件 31 號）。

主義，則在無罪推定的原理下，參酌釋字第 384 號解釋列舉之程序法上多項權益之性質，管見以為，於刑事程序中為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身自由之侵害抑止於最低限度內不可或缺的建制及權利，均應屬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內容<sup>42</sup>。」

3. 王國棟法官亦曾介紹：「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是一個總概性刑事程序原則，即指整個刑事程序（含偵查、控訴、審判與執行）必須依據法律所明定之程序規範，而且所有之法定程序之規定內容必須是公平而正當合理，一方面使國家機關受到程序規範之拘束與限制，而能夠透過此等法定程序，得以兼顧發現真實與保障人權，正確無誤而公平地行使刑罰權；另方面則使所有參與刑事程序之訴訟主體彼此間具有『武器對等性』（Waffengleichheit），而能處於平等之地位以參與刑事程序，並使人民得以依據法定程序參與刑事程序，行使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而受到公平之追訴與審判<sup>43</sup>。」
4. 王銘勇法官亦提出：「刑事訴訟法係實用之憲法，在美、日等憲法設有詳細刑事訴訟程序之國家尤然，……為充分保障人民在刑事訴訟程序之權利，從事審判者對人民在憲法上所應享有刑事訴訟之權利即應有充分之認知，裁判者處理刑事訴訟程序如果度執著於實質真實，置達法程序而不論，人民在刑事訴訟正當程序之權利即不能

<sup>42</sup> 陳運財，憲法正當程序之保障與刑事訴訟——以釋字第 384 號為中心，收錄於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劉孔中、李建良主編，1998 年 6 月，頁 323（附件 32 號）。

<sup>43</sup> 王國棟，論我國憲法第八條所定「法定程序」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中律會訊第 8 卷第 1 期，2005 年 10 月，頁 5（附件 33 號）。

1 獲得充分之保障，且此決定恐亦與社會認知有差別。……

2 是以裁判者應對我國憲法所定刑事訴訟之正當法律程序  
3 規定之內涵有充分之認知<sup>44</sup>。」

4 (二) 又依照 大院釋字第 669 號、第 646 號及第 551 號等解釋，  
5 立法機關如為保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並認施以  
6 刑罰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  
7 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雖得以刑罰規範限制人民身體之自  
8 由，惟刑罰對人身自由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仍須合  
9 乎比例之關係，尤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危害、  
10 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而與憲法第  
11 二十三條比例原則無違。而通說認為，比例原則本即具有「禁  
12 止過度」之內涵<sup>45</sup>， 大院釋字第 641 號、第 685 號、第 716  
13 號解釋更明揭對於人民違反法律上義務，應按其違規情節之  
14 輕重程度，定其所受處罰之輕重，以求責罰相當；據此，立  
15 法者應有義務設置適當調整機制，以避免個案處罰過苛之  
16 情，俾符實質正義之追求，此即「禁止過苛原則」。

17 (三) 復按，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2002 年時即已於 *Atkins v. Virginia*  
18 一案中肯認，對智能障礙者執行死刑，構成謂殘酷且異常之  
19 刑罰，為一違反禁止過苛原則之違憲刑罰：

- 20 1. 首參，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8 條所禁止「殘酷且異常之  
21 刑罰」，涵蓋要求罪刑相當原則，或禁止過處罰過苛之  
22 情形（disproportionate punishment）。申言之，判斷個案  
23 當事人所受之刑罰是否為「殘酷且異常」，並非在於探

<sup>44</sup> 王銘勇，憲法之刑事訴訟正當程序（下），新竹律師會刊，第 5 卷第 2 期，2000 年 4 月，頁 10（附件 34 號）。

<sup>45</sup> 陳新民，憲法學釋論，2015 年 5 月，修正八版，頁 186（附件 35 號）。

究該刑罰本質或刑度本身之輕重，而應審視個案當事人違法情節與所受刑罰是否相當，否則「如因感冒而受處罰，縱使只坐一天的牢，仍構成殘酷且異常之刑罰」<sup>46</sup>」

2. 至於何種情形構成「殘忍且異常刑罰」，而有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8 條之適用，聯邦最高法院指出，應參酌當時一般社會通念及社會認知。申言之，隨著社會發展益發成熟，對於「殘忍且異常刑罰」之標準亦可能隨之變動，在該標準下，則應盡可能以客觀因素為依據，行比例原則之審查<sup>47</sup>。根據最高法院觀察，自 1990 年代起至今日為止，美國各州均已陸續通過「智能障礙者應豁免於執行死刑」的相關法律<sup>48</sup>，顯見具有智能障礙之犯罪行為人之有責性較一般犯罪行為人為低一事，已為社會通念所肯認，而亦無任何州；縱使有部分州仍允許對於智能障礙者執行死刑，實際上被執行的案例仍屬罕見<sup>49</sup>。最高法院基此認為，不得對於智能障礙者宣判與執行死刑一事，不僅已為實務所肯認，同時亦是國民共識（national consensus）之展現。

3.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智能障礙」之醫學臨床定義

<sup>46</sup> Atkins v. Virginia, 536 U. S. 304, 311 (2002). ("Even one day in prison would be a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for the 'crime' of having a common cold.") (參附件 18 號)

<sup>47</sup> Id., at 311. ("The Amendment must draw its meaning from the evolving standards of decency that mark the progress of a maturing society. Proportionality review under those evolving standards should be informed by 'objective factors to the maximum possible extent.'") (參附件 18 號)

<sup>48</sup> 包含肯塔基州、田納西州、喬治亞州、馬里蘭州、阿肯色州、新墨西哥州、科羅拉多州、華盛頓州、印第安那州、堪薩斯州、紐約州、內布拉斯加州、佛羅里達州、南達科他州、德州、北卡羅萊納州、康乃狄克州、亞利桑那州、密蘇里州等。

<sup>49</sup> Atkins v. Virginia, 536 U. S. 304, 315 (2002). ("The large number of States prohibiting the execution of mentally retarded persons (and the complete absence of State passing legislation reinstating the power to conduct such executions) provides powerful evidence that today our society views mentally retarded offenders as categorically less culpable than the average criminal.... Moreover, even in those States that allow the execution of mentally retarded offenders, the practice is uncommon.") (參附件 18 號)



為「在智力功能和適應行為上具有顯著限制情形」，縱智能障礙者能辨是非、能完成受審程序，尚不改變智能障礙者因生理上缺陷而不能完全理解與處理所獲資訊、無法進行有效溝通、無法自錯誤與經驗中學習、無法進行邏輯推理、無法控制衝動、無法理解他人反應等不足<sup>50</sup>。而對智能障礙者科以死刑，尚難收刑罰應報（retribution）與預防（deterrence）之效，智能障礙者更可能因其智力與適應功能上之缺陷，於受審過程中作成不利於己之虛偽供述（false confession），亦無法如一般人對於一個或多個加重因素有效辯護、以降低刑責。最高法院最後指出，姑不論智能障礙者難以給予辯護人有效的協助、或其案件通常欠缺目擊證人等，智能障礙者尚可能因其所展現的外在形象，使人錯以為其對於犯行毫無悔意<sup>51</sup>。

（四）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嗣分別於 2013 年 *Hall v. Florida* 案與 2016 年 *Moore v. Texas* 案中<sup>52</sup>，再度肯認「對智能障礙者執行死刑係屬殘酷且異常之刑罰、而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8 條規定」，更強調「智能障礙」之認定不應以智商數值為唯一判準，更不得將非臨床醫學專業判斷因素納入考量。

（五）上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三案判決所揭，對於智能障礙者執行

<sup>50</sup> *Id.*, at 318. ("Mentally retarded persons frequently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and are competent to stand trial. Because of their impairments, however, by definition they have diminished capacities to understand and process information, to communicate, to abstract from mistakes and learn from experience, to engage in logical reasoning, to control impulses, and to understand the reactions of others.") (參附件 18 號)

<sup>51</sup> *Id.*, at 320. ("Mentally retarded defendants may be less able to give meaningful assistance to their counsel and are typically poor witnesses, and their demeanor may create an unwarranted impression of lack of remorse for their crimes.") (參附件 18 號)

<sup>52</sup> *Hall v. Florida*, 134 S. Ct. 1986, 2001 (2014); *Moore v. Texas*, 137 S. Ct. 1039, 1058 (2017). (參附件 19 號)

死刑，顯構成殘酷且異常之刑罰。 大院實得依據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及 大院歷來解釋所建立之「禁止過苛原則」，檢視我國對智能障礙判處死相關法規。經查，刑事訴訟法第 465 條第 1 項規定：「受死刑之諭知者，如在心神喪失中，由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命令停止執行。」依我國現行法制，當出現停止死刑執行原因時，並不當然停止執行，而須待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再行發布命令，始得停止執行，無疑係為停止執行加諸額外之限制，而非當然不得執行。

(六) 實則，「由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命令停止執行」之要件不具備任何合憲性公益目的，且無論有無執行死刑，受刑者均處於受監禁狀態（隨時可執行狀態），並無因誤認有停止執行事由而無法執行，或因確認是否有停止執行事由時間過長而無法執行情形，採取當然停止執行方式亦無礙於執行之遂行。且查，本條規定未提供司法最高行政機關判斷何時應命令停止執行之標準，致使智力障礙受刑人是否命令停止執行死刑，流於司法最高行政機關之主觀及恣意判斷，除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外，更違反比例原則。尤有甚者，一旦有停止執行事由，卻因司法行政最高機關遲未發布停止執行命令而執行者，將造成不可回復之違憲侵害人民生命權之結果。為確保死刑執行與違憲侵害受刑者生命權，兩相比較，孰為輕重，顯而易見，如因微小的執行利益而犧牲生命權，顯非憲法所許，益徵刑事訴訟法第 465 條第 1 項規定由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命令停止執行，顯已過度侵害人民生命權，違反禁止過苛原則，而悖於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要求。

四、刑法第 63 條規定及刑事訴訟法第 465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准予

對智能障礙者宣判或執行死刑，無法達成現行刑事政策教化、矯治之目的，更過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人格尊嚴與生命權，而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有違。

(一) 憲法第 7 條至第 22 條所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憲法第 23 條定有明文。依據 大院歷來解釋，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內涵有四：其一要求法律目的應合憲，即目的正當性；其二則係法律所採取之手段有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即適合性；其三係法律所採取之手段，在達到立法目的相同有效之情形下，應選擇對人民權利侵害最小者，即必要性；最後，法律取手段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公共利益目的之達成顯失均衡，即衡平性（大院釋字第 476 號、第 544 號、第 551 號解釋參照）。本件聲請客體均涉及重要基本人權，如人性尊嚴、生命權與人格權等，對聲請人影響甚為重大，又因刑罰權之實施侵害權利甚鉅，故應採取最嚴格之比例原則審查基準，法律之目的與手段間應具備緊密關聯，方謂合於比例原則要求。<sup>53</sup>

(二) 對智能障礙者宣判或執行死刑，無助於應報主義或預防原則等刑罰目的之達成：

1. 按刑法之任務與刑罰之目的，在於規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預防犯罪、維護社會秩序，並維持保護法益與社會共同生活的基本倫理價值。而刑罰之理論歷來可分為「應

<sup>53</sup> 參如 大院許玉秀大法官於釋字第 594 號解釋部分協同意見書：「就刑罰規範而言，因為行為規範本身已涉及各種行為自由的限制，而制裁規範除涉及財產權的剝奪或限制之外，尚涉及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權的剝奪，不但應該採取嚴格的審查標準，且應該就行為規範及制裁規範分別審查。...對剝奪生命權、終身剝奪人身自由以及長期或短期剝奪人身自由的刑罰規範，不可能容許以低密度標準、甚至中密度審查標準進行合憲審查。」（附件 36 號）

報理論」、「一般預防理論」、「特別預防理論」三者<sup>54</sup>。惟現階段刑事政策之目的，已並非單在實現以往應報主義之觀念，而在於如何能夠透過刑罰預防犯罪，即「預防理論」，其中又以「特別預防理論」於刑事制裁體系中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sup>55</sup>。特別預防理論則側重於預防個別犯罪人再犯，在此理論下，刑罰制裁除考量社會正義外，更重視教化功能，以期行為人能重新適應社會生活<sup>56</sup>；尤其係宣判時之量刑、以及刑之執行等階段，均應以行為人為主要考量對象，並以矯治與再社會化為優先目的<sup>57</sup>。準此，刑事制裁之設計與執行上，即應將犯罪人分類、並給予不同之制裁措施，以達成刑罰目的；如全以報應刑之思考模式，則將失去施以刑罰之意義。例如對於少年犯，應施以感化教育或社會處遇，對於精神障礙者應收容於醫療機構以強制治療等<sup>58</sup>。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指出，智能障礙者既欠缺一般人所具有之認知、控制、判斷能力，對於刑罰手段以及欲達成目的之認知有理解困難，是對其施以與一般成年犯罪者相同之刑罰，並無助於嚇阻及預防目的之達成，顯不符合比例原則適合性之要求。

## 2. 退步言之，縱以死刑留存論所提倡之「應報理論」觀之<sup>59</sup>，

<sup>54</sup> 張麗卿，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增訂四版，2012年9月，第38-39頁（附件37號）；王皇玉，刑法總則，2016年10月，修訂二版，第13頁（附件38號）。

<sup>55</sup> 張麗卿，前揭註54，第43頁（參附件37號）。

<sup>56</sup>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289號刑事判決（參附件22號）。

<sup>57</sup> 劉傳琛，論刑罰的目的—應報之綜合理論的再建構，刑事法雜誌，第59卷第5期，2015年10月，第70、72頁（附件39號）。

<sup>58</sup> 王皇玉，前揭註54，第19頁（參附件38號）。

<sup>59</sup> 張麗卿，前揭註54，第492頁（參附件37號）。

仍無容許對於智能障礙者宣判或執行死刑之餘地。蓋應報理論雖係謂「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仍不能逸脫於「罪責相當」之原則，即應確保責任程度與刑罰輕重相互合致、高低程度相當<sup>60</sup>。按罪責係建立在「人具有自由意志」之前提假設，屬於犯罪人自由意志下決定下之行為，方有法律上責任（即罪責）可言。從而，罪責原則係指「無責任即無刑罰」，倘為欠缺識別能力或控制能力之人，則屬不具有罪責能力者<sup>61</sup>。而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指出，智能障礙者在認知、能力和社會適應上有障礙，不具一般人之自我判斷與控制能力，如將此種欠缺識別能力之人科以死刑，顯與罪責相當原則有違，無助刑法目的達成。

3. 如 *Atkins v. Virginia* 一案，美國聯邦法院已闡明：「除非對於智能障礙者執行死刑一事，對於應報或預防其中一個目的有可量化的貢獻，否則對於智能障礙者執行死刑，僅是不具目的正當性與手段必要性、且使智能障礙者徒增痛苦的違憲刑罰。」<sup>62</sup>

(三) 對智能障礙者宣判或執行死刑，顯已構成酷刑，而悖於比例原則之必要性要求：

1. 按，刑罰之科處與執行，均應遵守人道原則，並應受人道主義的制約<sup>63</sup>。而人格尊嚴之維護乃世界人權宣言所揭

<sup>60</sup> 林山田，前揭註 10，第 416-417 頁（參附件 7 號）；張麗卿，前揭註 54，第 39-40 頁（參附件 37 號）；王皇玉，前揭註 54，第 14 頁（參附件 38 號）。

<sup>61</sup> 王皇玉，前揭註 54，第 53-54 頁（參附件 38 號）。

<sup>62</sup> *Atkins v. Virginia*, 536 U. S. 304, 319 (2002). ("Unless the impos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on a mentally retarded person 'measurably contributes to one or both of these goals, it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purposeless and needless imposition of pain and suffering,' and hence an unconstitutional punishment.")（參附件 18 號）

<sup>63</sup> 李念祖，刑罰功能與應報論均應受人道主義制約：對死刑維持論的答覆，司法改革雜誌第 47 期，2003

示之重要人權精神，並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亦已為 大院釋字第 372 號所揭櫫<sup>64</sup>。準此，為使人性尊嚴受到保障，酷刑及其他非人道之刑罰手段均應禁止，此參 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以及我國批准且生效施行之公政公約第 7 條，均定有明文<sup>65</sup>。而對智能障礙者宣判或處以死刑，即在應加以禁止之列<sup>66</sup>。

2. 次按，公政公約第 6 條第 2 項亦規定：「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可知死刑縱然未經廢除，仍屬最後的刑罰手段，除非係犯情節最重大之罪，否則不得對行為人科以死刑。

5. 復觀諸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落實國際人權公約初次報告之審查國際獨立專家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57 點，同樣要求我國直到完全廢除死刑之前，應嚴格遵守相關程序及實質之保護措施，特別是心理或智能障礙者不得被判處死刑或執行死刑（參附件 12 號）。由是可知，在各項刑罰中，死刑本身即具有最後手段性，遑論在犯罪人為智能障礙者之情形下，更應以死刑以外之刑罰手段為優先，方符人格尊嚴之維護與人權保障之精神。

年 10 月，第 17 頁（附件 40 號）；王皇玉，前揭註 54，第 56 頁（參附件 38 號）。

<sup>64</sup> 參照 大院釋字第 372 號解釋理由書：「人格尊嚴之維護與人身安全之確保，乃世界人權宣言所揭示，並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附件 41 號）

<sup>65</sup> *Roper v. Simmons*, 543 U.S. 551, 560（附件 42 號）

<sup>66</sup>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早於 2002 年即在 *Atkins v. Virginia* 一案中揭櫫：「對智能障礙者執行死刑，係屬殘忍且非尋常的刑罰，而應為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所禁止」 *See Atkins v. Virginia*, 536 U. S. 304, 307 (2002). ("Execution of mentally retarded criminals are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 prohibited by the Eighth Amendment.")（參附件 18 號）

6. 承前所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Atkins v. Virginia* 案、*Hall v. Florida* 案與與 *Moore v. Texas* 案均肯認對智能障礙者執行死刑，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8 條禁止殘酷且異常刑罰之規定。*Atkins v. Virginia* 案中，法院認定數州制定法律禁止對智能障礙者執行死刑，或即使未特別立法禁止對智能障礙執行死刑，亦鮮少對於智能障礙者執行死刑之現象，顯示現今社會普遍已就智能障礙者執行死刑已構成過苛刑罰，並指出因智能障礙者對於自身行為之不可控，且就刑罰目的有理解障礙，或於審判過程難以為自身辯護等因素，對其執行死刑實為殘酷且異常刑罰，而悖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8 條規定<sup>67</sup>。

7. 智能障礙係因智力功能缺陷、智能發展不足而致生認知與行為障礙，無法完全理解違法行為與刑法意義，亦難以控制自身行為，已如前述，其犯罪之惡性與目的，並不符合「情節最重大」情形，依據公政公約第 6 條第 2 項規定，不得處以死刑。為使智能障礙者理解刑罰目的或其行為認知，應施以矯治或其他相同有效之替代手段，惟若罔顧其認知與行為之缺陷，仍於刑罰權之實施上，強行採取與一般成年犯罪者相同之方式，予以判處或執行死刑，實屬顯不相當之刑罰，足見對於智能障礙者執行死刑並非最小侵害手段，違反比例原則必要性之要求。

(四) 承上可知，對智能障礙者判處或執行死刑，不僅無法達成刑罰之預防或應報目的，反而剝奪其生命權以及立基生命權所

<sup>67</sup> *Atkins v. Virginia*, 536 U. S. 304, 314-6 (2002). (參附件 18 號)

應享有之人格尊嚴、人格權等憲法所賦予之基本人權，顯因難以達成之公益目的，過度犧牲個人權利，無法通過比例原則適當性、必要性與衡平性之檢驗，且與刑罰目的之達成不具備緊密關聯。

五、刑法第19條第1項與第2項規定之「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對智能障礙者減輕刑責要件造成差別待遇，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要求。

(一) 大院解釋所揭示之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要求應依據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差別待遇，不僅差別待遇之目的需合憲，且所為差別待遇更應與規範目的具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大院釋字第682號、第694號、第701號、第719號、第722號、第727號、第750號解釋參照），已如前述。

(二) 刑法第19條第1項與第2項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係考量智能障礙者其在理性、判斷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上均有不足之處，難以理解刑事政策、刑罰與罪責之意義，所為減輕智能障礙者刑責之規定，惟刑法第18條：「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罰。（第1項）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第2項）滿八十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第3項）」與第20條：「瘡啞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亦係針對與智能障礙者同樣對於難以理解刑事政策、刑罰與罪責意義之未成年人或瘡啞人，所為刑責之減輕規定，卻未如同刑



1 法第19條第1項與第2項規定加上「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  
2 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3 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  
4 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5 等要件，足見立法者對於同樣對於自我行為控制與理解刑罰  
6 意義有困難之未成年人、瘡啞人與智能障礙者間，適用不同  
7 之減輕刑責要件，形成欠缺實質理由之差別待遇。

8 (三) 智力功能缺損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斷智能障礙者之其一標  
9 準，通常以智力商數反映智力發展受限情形，智力功能之缺  
10 損則導致智能障礙者對於事務之理解能力可能停留在未成年  
11 人之智識程度，且觀諸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所定之身心障礙者  
12 鑑定表，亦將心智商數與心智年齡相互對應（參附件16號），  
13 故智能障礙者心智狀態與未成年人本可相為比擬。而刑法第  
14 20條對於瘡啞人減輕刑責之規定，同樣基於瘡啞人可能因學  
15 習能力或理解能力受到限制，而無法期待其完全理解法律意  
16 涵。由此可見，未成年人、瘡啞人與智能障礙者對於法律意  
17 涵理解之困難，均係因自身障礙所導致理解能力受限情形，  
18 在法律上應受相同之評價，並無得為差別待遇之實質正當理  
19 由。

20 (四) 經查，依據刑法第18條與第20條規定，凡身為未成年人或瘡  
21 啞人，即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並未如刑法第19條第1項與第2  
22 項增設欠缺或減著降低識別能力，始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要  
23 件，且該要件既非定義智能障礙之內涵，亦無助於減輕智能  
24 障礙者責任能力之立法目的達成，更非區別智能障礙者與未  
25 成年人理解法律意義之正當理由，顯見該要件與減輕智能障

礙者刑事責任之目的上，並不具備任何關聯，卻對於智能障礙者之減輕刑責要件造成差別待遇，而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之要求，至為明確。

#### 六、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之「心智缺陷」與刑事訴訟法第465條第1項規定之「心神喪失」顯已牴觸法律明確性原則。

(一) 所謂法律明確性原則，係指一般人民得依據現今社會之文字語言習慣或日常生活經驗，理解法律規範內容及其意義，並基於該理解知悉法律所規範之行為態樣，以預見與判斷自身行為是否為法律之規範對象。司法機關亦得依據法律規定內容及其意義，加以判斷個案事實是否符合法律規範之情形<sup>68</sup>。法律明確性原則審查密度之寬嚴，應視該法律規範所涉及之基本權利種類為何， 大院釋字第522號與第580號解釋所提出之「刑罰明確性原則」，即強調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要求應與該法律對人民權利之影響相稱，刑罰規範中所要求之法律明確性，更應提高至人民得從法律規定中「預見其行為之可罰」之程度。其後釋字第636號解釋理由書更進一步闡明，凡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或刑罰處罰者，應受較嚴格密度之審查。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之「心智缺陷」涉及人民刑事責任能力之判斷，涉及罪責之免除或減輕；刑事訴訟法第465條第1項規定之「心神喪失」則直接關乎死刑之執行與否，兩者均涉及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人性尊嚴、憲法第15條保障之生存權與第22條人格權等基本人權，對聲請人權利影響甚鉅，依照 大院過往往釋字先例，自應以最嚴格密度之法律明確性予以審

<sup>68</sup> 參照 大院釋字第636號、第690號解釋與釋字第636號解釋林子儀前大法官及許宗力大法官共同提出部分協同意見書（附件43號）。

查。

(二) 刑法第19條第1項判斷責任能力之法定要件原為「心神喪失」與「精神耗弱」，然因該用語內容極不明確，遂於94年2月2日修正為「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根據其立法理由：「關於責任能力之內涵，依當前刑法理論，咸認包含行為人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以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至責任能力有無之判斷標準，多認以生理學及心理學之混合立法體例為優。易言之，區分其生理原因與心理結果二者，則就生理原因部分，實務即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而由法官就心理結果部分，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究屬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與否。在生理原因部分，以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在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附件44號）

(三) 「心智缺陷」屬法律創設之不確定概念，並非醫學專有名詞，反觀我國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之「心智缺陷」，實為內容高度抽象之法律概念，無從確定是否由醫學專業加以認定，亦欠缺具體之判斷標準及判斷程序，不僅無法使受規範者知悉其內涵，更於司法實務之運作上，流於個案法院之恣意與專斷，顯然無法通過法律明確性原則審查。縱立法理由說明此概念「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然而依照本條規定，一般人民無法理解對於心智缺陷之判斷，是否得不經醫學專家鑑定而得由法院自行認定，或須以醫學專家鑑定認定為準，或法院得審酌醫學專家鑑定結果後自行予以認定。

1. 按責任能力之有無或程度與個人精神狀態、有無心理疾

病、智能發展程度等各種生理及心理因素密切相關，已涉及醫學專業領域之判斷，無從單由法律專業角度認定之，亦難以切割或區分醫學與法律各自認定之部分，是就該等高度涉及醫學專業領域之不確定法律概念，自應以醫學專家之判斷為優先，法院應就醫學專家之心智缺陷認定結果予以尊重。

2. 且查，縱使認為本條規定係指法院應以醫學專家鑑定以作為認定行為人是否構成心智缺陷之基礎，惟刑法第19條之規定顯然亦未就心智缺陷之專業鑑定認定標準與程序予以規範（諸如：醫學專家鑑定單位之資格、鑑定期間、鑑定程序及流程、鑑定費用、以及鑑定次數等），顯見受規範者不僅無從依據一般日常生活與語言經驗加以理解，亦無從預見規範意涵，法院更欠缺可與具體適用該項規定之標準。

3. 而查，現行司法實務對於刑法第19條第1項「心智缺陷」，以及該心智缺陷是否影響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之判斷，確實存在分歧而並未形成具體之判斷標準與程序（本案聲請人認為法院之法律見解無誤，所爭執者為其正確適用之法律業已違憲）：

- (1) 部分判決以精神鑑定報告認定行為時是否具有心智缺陷，再綜合其他事證判斷有無影響其辨識能力<sup>69</sup>；
- (2) 部分判決參酌精神鑑定報告所載行為時是否具有心智缺陷，以及是否因心智缺陷欠缺辨識能力，再綜

<sup>69</sup>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3 年度上重訴字第 610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重更(一)字第 4 號刑事判決（附件 45 號）。

合其他事證判斷有無影響其辨識能力<sup>70</sup>；

(3) 部分判決則直接採用精神鑑定報告以及鑑定證人供述所認定是否構成刑法第19條第1項之判斷結果<sup>71</sup>。

4. 實務上，精神鑑定報告多採用智力（能）測驗數值作為認定智力之標準<sup>72</sup>。參照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重訴字第10號刑事判決，該鑑定人劉英杰醫師指出：「目前臺灣精神醫學會並未針對司法精神鑑定訂定所謂的標準作業流程，尊重鑑定人依照當時的訊息來判斷下一步應該問些什麼；臺北榮民總醫院的鑑定流程，從收到法官或檢察官的委任函開始，針對所需要鑑定的項目安排日期、鑑定人與心理師，有時候會再安排社工師與職能治療師；實施鑑定當天，原則上先由鑑定的主要醫師詢問病人狀況，接下來由心理師安排一些心理測驗，還有社工師、職能治療師接下去做；至於鑑定人部分，主要是看法院委任函之內容，以本案來說，是問被告的責任能力，我們會依據刑法第19條規定要件：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辨識能力與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等要件來做問題設計。」（參附件46號）即可反映實務上之精神鑑定欠缺一致性之程序及標準。

5. 姑不論我國對於刑事審判程序之精神鑑定過程尚欠完

<sup>70</sup>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2 年度上訴字 852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2 年度上訴字 1214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4 年度上訴字 604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上重訴字 10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5 年度上訴字 433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上訴字第 1750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重訴字第 2 號刑事判決（附件 46 號）。

<sup>71</sup>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上訴字第 130 號刑事判決（附件 47 號）。

<sup>72</sup>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2 年度上訴字 1214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3 年度上重訴字第 610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上重訴字 10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重訴字第 2 號刑事判決（參附件 46、47 號）。

善、且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疑義<sup>73</sup>，就刑法第19條第1項因欠缺明確性而造成法院實務運作與適用之問題，學者亦多有批評：

- (1) 學者如法思齊指出：「行為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雖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來認定，然其是否因該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而影響其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則必須由法官綜合證據所得心證進行判斷，而不可囑託鑑定來加以認定。此一立場，亦可參照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368號刑事判決。然司法實務上，由法官或檢察官囑託專業鑑定人就行為人是否具有刑法第19條之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來加以認定之情形依然偶而可見。本案臺北榮民總醫院精神部所提供之精神狀況鑑定書內，負責鑑定之醫師即於其中自行認定龔男思覺失調症之相關症狀並未影響其在犯案時刑法第19條要求存在之『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因此應無刑法第19條之適用。此項鑑定意見已明顯逾越專家鑑定之範圍，而有越俎代庖侵害法院作為終局責任能力有無之判斷

<sup>73</sup> 翁國彥，瘋癲與審判：死刑案件中的精神障礙被告，「鬼島」生與死：2014 台灣國際廢死研討會，頁 2-3：「在精障者死刑案件中，精神鑑定程序不但事屬關鍵，甚至事關生死。遺憾的是，我國目前刑事司法鑑定存在不少可能抵觸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疑義，進而導致法院依據鑑定結論作成死刑判決，將構成《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禁止的國家恣意剝奪生命權。」（附件 48 號）；張麗卿，刑法第十九條之法理分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136 期，2006 年 9 月，頁 171-172：「鑑定人本應保持客觀、超黨派及公正的態度來鑑定，然事實顯示，有不少因為鑑定上的錯誤或誤會，導致在實務上無法適用的例子。……由於鑑定人誤解自己在訴訟程序上的角色，造成在訴訟開始便希望提供法院絕對及肯定的意見；在審判程序中，鑑定人替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或是鑑定人願意接受病人較輕微判決的情況。這種在德國所面臨的難題，台灣似乎也發展相同情況。」（附件 49 號）；湯文章，精神醫療鑑定與刑事審判——以現行鑑定制度的缺失為中心，真理財經法學，第 17 期，2016 年 9 月，頁 38 以下（附件 50 號）。

機關之問題<sup>74</sup>。」

- (2) 黃榮堅教授亦曾批判：「綜觀系爭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判決，非但根本不曾(!)進行上開經驗法則之論證，亦全無推翻鑑定報告結論的其他有力科學證據，僅僅援引『已經被鑑定報告排除』之疾病影響因子反覆陳述，而直接忽略鑑定書中其他事實基礎，斷章取義地作成結論。……如果再深入探究，就可以知道這樣的論述方式不惟過於簡略，且相當危險，極易由此落入『以行為推論心理，以心理解釋行為』的循環論政邏輯困境，並且同樣的事實很可能形成完全相反的解釋<sup>75</sup>。」

- (3) 黃致豪律師亦曾評論：「……法官與精神醫師常常只因為『被告懂得選用兇器』、『被告懂得選下手目標』、『被告了解如何到達犯罪地點』、『被告雖有症狀，但症狀沒有直接命令他犯罪』等理由，便略過應該深入針對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的違法性認識和期待可能性的探討，也放棄了針對精神病理症狀所影響的各項能力與上開法律能力基準採取對應性探究的機會<sup>76</sup>。」

- (四) 再查，刑事訴訟法第465條第1項規定之「心神喪失」，原與「精神耗弱」同屬刑法第19條第1項責任

<sup>74</sup> 法思齊，割喉魔之審判——精神障礙與死刑，月旦法學教室，第167期，2016年9月，頁61-62（附件51號）。

<sup>75</sup> 黃榮堅，兇殘？異常？突發性失能之規範性判斷問題——評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233號判決，法令月刊，第60卷第9期，2009年9月，頁40-41（附件52號）。

<sup>76</sup> 黃致豪，心智障礙與刑事責任之謎——以思覺失調症為例：淺談辨識能力、控制能力與司法精神鑑定，全國律師，2015年11月，頁12（附件53號）。

能力要件，惟因內容未盡明確、難以判斷，故於94年修正刑法第19條第1項時予以刪除，並增訂「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足見「心神喪失」較「心智缺陷」更為不明確。而刑事訴訟法第465條規定受死刑宣告為心神喪失者，應停止死刑執行，是刑事訴訟法第465條第1項對於受死刑宣告者而言，影響權利程度更甚於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明確性要求程度更高，惟誠如上述，既心智缺陷已無法通過嚴格密度之法律明確性審查，刑事訴訟法第465條第1項規定之「心神喪失」自亦悖於法律明確性之要求。

七、刑法第 63 條與刑事訴訟法第 465 條第 1 項允許對智能障礙者判處及執行死刑，顯悖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要求以及憲法第 16 條對於訴訟權之保障。

(一) 憲法所要求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不僅指國家機關行為所依循之程序應由法律制定，其內容更應合於實質正義，如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倘內容欠缺實質正義，則牴觸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要求，此為 大院釋字第384號解釋明揭。公政公約第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一、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二、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死刑非依管轄法院終局判決，不得執行。」其中「不得無理剝奪」即指死刑之審判與執行均應遵守內容與程序符合實質正義之法律，而公政公約第14條就審前與審判程序詳實規定，是「與本公約規定不牴觸之法律」亦包含



不得牴觸第14條之正當程序要求。

(二) 復依據 大院釋字第396號與第653號解釋，憲法第16條規定之訴訟權為制度性保障，以正當公正程序為其核心，內涵包括保障人民之聽審權、防禦權，以及採取武器平等原則等要求<sup>77</sup>。而訴訟被告防禦權之完整行使，關乎被告是否理解訴訟程序中所為行為之法律效果、對自身所知事實之表達能力與自我辯護之能力，並協助辯護人為其進行有利辯護，此均影響審判程序之正當性與完整性。

(三)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Atkins v. Virginia* 案與 *Hall v. Florida* 案均指出，智能障礙者面臨一種錯誤執行死刑之特殊風險，即智能障礙者可能因認知上的障礙而進行虛偽陳述、所為證言可信度較低，且較無法提供辯護人有益資訊，無法享有正當程序之保障，應禁止對其執行死刑<sup>78</sup>。

(四) 而在我國憲法對於刑事被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與訴訟權之保障上，應使其享有正當且完備之審判過程，以確保防禦權之充分行使，惟智能障礙者因自身生理與心理之限制，對於法律意涵、辨識事實或證物是否有利，以及審判程序中所為陳

<sup>77</sup> 大院釋字第396號解釋意旨：「憲法第十六條所定人民之訴訟權，乃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得訴請救濟之制度性保障，其具體內容，應由立法機關制定法院組織與訴訟程序有關之法律，始得實現。惟人民之訴訟權有其受憲法保障之核心領域，為訴訟權必備之基本內容，對其若有欠缺，即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不符。」（附件54號）大院釋字第653號解釋意旨：「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本院釋字第四一八號解釋參照）。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原則，人民權利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本院釋字第三九六號、第五七四號解釋參照），不得因身分之不同而予以剝奪（本院釋字第二四三號、第二六六號、第二九八號、第三二三號、第三八二號、第四三〇號、第四六二號解釋參照）。」（附件55號）

<sup>78</sup> *Atkins v. Virginia*, 536 U. S. 304, 320 (2002). ("Mentally retarded defendants may be less able to give meaningful assistance to their counsel and are typically poor witnesses, and their demeanor may create an unwarranted impression of lack of remorse for their crimes....Mentally retarded defendants in the aggregate face a special risk of wrongful execution."); *Hall v. Florida*, 134 S. Ct. 1986, 1993 (2014). ("Prohibiting such executions also protects the integrity of the trial process for individuals who face 'a special risk of wrongful execution' because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give false confessions, are often poor witnesses, and are less able to give meaningful assistance to their counsel.")（參附件18號）

述法律效果之理解與表達均有障礙，致無從有效為自身辯護，亦難以提供辯護人有利資訊，辯護人得協助其行使防禦權部分實屬有限，即使審判程序所踐行之法律程序均符合法定要求，仍無法有效確保智能障礙者之權利，足見智能障礙者就刑事辯護權與防禦權之行使上，具有無法治癒之不足，於此情形下形成之死刑判決及其執行亦難謂具備正當性，是對智能障礙者判處或執行死刑，有悖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及憲法第16條對於訴訟權之保障。

肆、確定終局判決案號及所援用之法令：

案 號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392 號刑事判決
適 用 法 律	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
與確定判決具 所適用法律具 備重要關聯性 之法律	刑法第 63 條、刑事訴訟法第 465 條第 1 項規定

伍、綜上，聲請人懇請 大院惠賜有利之解釋，以維權益及憲法法制，無任感禱。

謹 狀

司 法 院 公 鑒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31 日

具狀人：聲 請 人 林于如

撰狀人：代 理 人 李念祖律師  
李劍非律師  
林欣萍律師  
陳思妤律師